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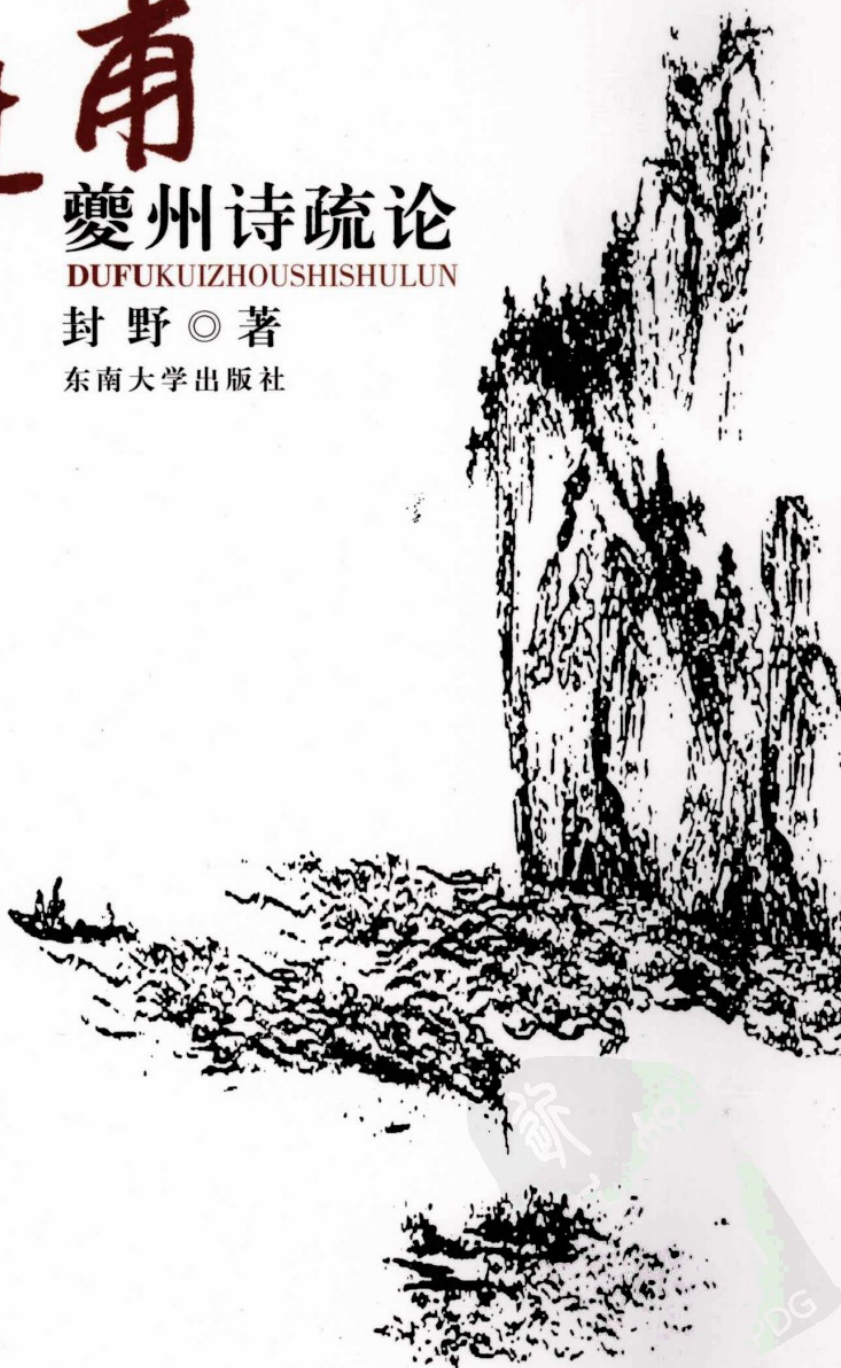
杜甫

夔州诗疏论

DUFUKUIZHOU SHISHULUN

封野◎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要目

杜甫夔州诗疏论

杜甫夔州诗疏论

封野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内 容 提 要

杜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 1 400 多首。他的诗歌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因而被称为“诗史”。

夔州时期是杜甫一生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许多重要作品皆出于此时。“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破灭,安史之乱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使得诗人晚年回归到远祸全身的人生本位,走上了为农自给的道路;而在精神层面上,他却依旧保持着兼济的志向。杜甫夔州时期的作品内容丰富,或描写琐细营生之事,或抒发老病孤独情怀,或回顾个人坎坷,或寻求心灵慰藉,对自我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关切成为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

本书在充分尊重杜甫“诗圣”地位的基础上,立足人性本真,紧扣杜甫的“诗人之心”和“诗人之性”,通过心理解读和作品解构,客观完整地展现了在价值取向与现实背离之后陷于自我冲突之中的杜甫晚年的心路历程和诗歌风貌,对于研究和把握杜甫的夔州诗作将有很大的裨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夔州诗疏论/封野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5641-1151-9

I. 杜… II. 封… III. 杜诗-文学研究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5994 号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 汉

网 址:<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件:press@seu.edu.cn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960mm×65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06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1151-9/I·7

印 数:1~4000 册

定 价:26.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目 录

第一章 心灵世界的重构	(1)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与社会恐惧	(2)
第二节 致君尧舜与政治迷惘	(20)
第三节 沧海桑田与本位回归	(28)
第二章 为农自给的尝试	(34)
第一节 从托迹官府到耕稼山村	(34)
第二节 村居生活实录	(39)
第三节 暮年情感素描	(57)
第三章 昨梦前尘的回望	(64)
第一节 理想自我的追寻与迷失	(64)
第二节 盛世繁华的眷恋与伤逝	(78)
第三节 中兴局面的怅惘与忧思	(90)
第四章 社会民生的关怀	(96)
第一节 关于河北藩镇问题	(96)
第二节 关于异族侵逼问题	(103)
第三节 关于蜀中战乱问题	(115)
第四节 关于征戍诛求问题	(120)
第五章 江山人物的浩叹	(129)
第一节 江涛万古峡 造化钟神秀	(129)
第二节 巫山多云雨 神女花钿落	(136)
第三节 英雄余事业 虚殿日尘埃	(142)



第六章 钟鸣漏尽的追问	(155)
第一节 杜甫离开夔州的原因	(155)
第二节 荆湘之行与生存危机的缘起	(166)
第三节 杜甫应对危机的态度与方式	(178)
杜甫年表	(186)
后记	(201)



第一章 心灵世界的重构

杜甫从大历元年(766)暮春至大历三年(768)初春,寓居夔州近两年。对于杜甫这段时期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宋人于臬在《修夔州东屯少陵故居记》中写道:

始至,暂寓白帝,既而复还瀼西,最后徙居东屯。质之于诗皆可考。峡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旷,独东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顷。前带清溪,后枕崇冈,树林葱蒨,气象深秀,称高人逸士之居,少陵于是卜筑焉。厌尘嚣而乐幽胜,而诗人所以为吟咏风月之地。夔州之诗,多至四百余篇,计一草一木,尽入诗句中矣。^①

根据于臬上述所提供的基本线索,用杜诗和相关文献材料进行补充和印证,可以梳理出杜甫在夔州的生活概况:杜甫在大历元年(766)暮春从云安迁居夔州,秋季移居白帝城西阁,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拂与资助,在瀼西买得果园四十亩,并在东屯营田百顷。大历二年(767)暮春赁居瀼西草堂,秋季迁居东屯茅屋,往返于东屯、瀼西之间。大历三年(768)初春赠瀼西果园于友人,携家眷乘舟出峡赴江陵。在此期间杜甫创作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占诗集收录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创作精力之旺盛,作品产量之丰硕,表现领域之开阔,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指出,杜诗“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

^① 引自《中华大典·唐文学部二》第七四三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下同。



事，一切意，无非诗者”^①。用这段话概括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风貌可谓恰如其分。

第一节 安史之乱与社会恐惧

发生在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分界，也是杜甫心路历程的转折。安史之乱期间，杜甫经历了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变故，其社会心态、政治心态和人生心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杜甫夔州时期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诗歌风貌。了解安史之乱以后杜甫心灵世界的基本风貌及其形成过程，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正确把握杜甫夔州生活和创作的前提。

一、安史之乱初期的社会认知

开元、天宝四十余年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社会安定，玄宗君臣和国人已经习惯用盛世眼光和乐观心态对待事物。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召集宰相商量对策，杨国忠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②玄宗完全同意杨国忠的看法，对乱世来临毫无知觉。玄宗久居深宫，受杨国忠蒙蔽误判形势，或算情有可原。不可思议的是身经百战的将帅也盲目乐观。当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回京述职，玄宗问以讨贼方略，封常清回答：“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都，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③于是玄宗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洛阳募兵抗敌，结果屡战屡败，直至洛阳失守。洛阳失陷后，封常清被就地正法，临刑前他上遗表给玄宗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④封常清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对社会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向朝廷传达了乱世来临的信息。

① 《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第四六四页。中华书局，1983。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六九三五页。中华书局，1956，下同。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六九三五页。

④ 《旧唐书》卷一四零，第三二二零页。中华书局，1975，下同。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被任为河西尉,不久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但对于已经在长安潦倒十年的杜甫仍然是件喜事,所以他在官定后立即回奉先探家去了。年底洛阳失陷,叛军逼近潼关,奉先一带陷入战乱。至德元载(756)四月,杜甫携带妻子儿女从奉先到白水县投靠舅氏崔瑒。杜甫最早明确提及安史战乱的诗篇是《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诗:

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慨彼万国夫,休明备征狄。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欲告清宴罢,难拒幽明迫。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①

“相公军”指哥舒翰率领的据守潼关的军队。哥舒翰时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称其为相公。杜甫惑于朝廷讨伐虚弱的胡羯,竟要举国征兵、八方围剿。他为百姓躬逢盛世却要投身兵戎而对酒落泪。可见直到洛阳沦陷、潼关紧急,杜甫仍然把安史之乱放置在太平盛世的框架内予以审视,认为社会依旧休明昌盛。

至德元载(756)六月潼关失守,白水一带亦陷入战乱,杜甫只得带着家眷向北逃亡。经彭衙、华原、三川诸县,最后在鄜州羌村安顿下来。在逃亡的日子里,杜甫和广大人民一起承受着战乱造成的深重苦难。是年八月,杜甫只身北上延州,准备投靠灵武新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俘押到已经沦陷的长安。在长安,杜甫亲历了惨烈的社会剧变,对社会形势有了新的认识。

(一) 长安大屠杀

在人类战争史上,屠城现象屡见不鲜,斗争双方中的一方取得胜利后,通常采取屠杀方式确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安禄山在长安开展大屠杀,不仅残酷杀害平民,而且把皇室成员、朝廷大臣及其眷属作为重点杀戮对象。这种现象是由特殊原因造成

①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一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下同。



的。安史之乱前，安禄山长子安庆宗久居长安，官拜太仆卿，尚荣义郡主。安禄山既反，玄宗斩安庆宗，赐荣义郡主死。史称安禄山得知安庆宗死讯，“在舆中惊哭曰：‘吾子何罪而杀之！’狂而怒，官军之降者夹道，命交相斫焉，死者六七千人，遂入陈留郡”^①。陈留大屠杀是安禄山为子报仇的序幕。占领长安后，他“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梃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②，“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③。杜甫在长安是否亲眼目睹杀戮场面不得而知，但他在《哀王孙》诗里记录了自己与一位逃亡的皇孙在长安街头邂逅的经历：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龙种，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④

诗中这位“王孙”是被玄宗遗弃在长安城里的皇孙之一。史载长安沦陷前夕，唐玄宗“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⑤。由于他出身在皇室，由于他没有及时跟随玄宗逃走，于是成为安禄山猎杀的对象，在经历了百日亡命生涯

① 《旧唐书》卷二零零，第五三二零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六九八四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六九八零页。

④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二零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六九七一页。



后,终因不堪困苦乞求为奴。在旧社会的战乱年代里,穷苦百姓为了活命卖儿鬻女或自请为奴的事情司空见惯,但这位腰悬宝玦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是在太平盛世里受到顶礼膜拜的社会至尊。他昔日锦衣玉食,如今体无完肤;昔日车马簇拥,如今独泣街头;昔日高贵尊严,如今乞求为奴;往日的神明与威严已然完全消失,沦为被肆意逐杀的猎物。杜甫从这位“王孙”的今昔变化中,初步体认了世道变迁。

(二) 杨贵妃之死

杨贵妃命歿马嵬驿的消息传到长安,给杜甫心灵造成强烈震撼。杨贵妃在天宝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天宝中期以后,杨贵妃受宠,杨国忠秉政,杨氏三姊妹皆封国夫人,杨氏家族依仗皇恩骄奢淫逸,声势煊赫。杜甫《丽人行》诗细致生动地描摹了杨门穷奢极欲的生活: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匭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褊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纭。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①

诗从杨氏姊妹窈窕匀称的体态,娴雅高贵的气质,珠光宝气的服饰等方面,刻画出她们美丽容貌和高雅风韵,展示了丽人的外在美,而“椒房亲”的裙带关系是她们穷奢极欲的依凭。诗中所展示的杨门豪奢享受和声色狂欢,是天宝后期上层贵族腐朽堕落和国家政治黑暗腐败的缩影,折射出天宝之乱的深刻原因。前人有云:“此诗刺天宝诸杨之骄横,由于上之宠禄过也。……读《丽人行》而见荒主之不戢嫔御,其骄盈之失若此。上慢下暴,恩义睽绝,岂复有君国子民之道?”^②又云:“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

① 《杜诗镜铨》卷二,第五十八页。

② 《中华大典·唐文学部二》第六七二页引《杜诗言志》卷二。



叹声，句逗处声声慨叹。”^①

及至安史乱起，玄宗西行，朝野上下对杨氏的不满终于转化为一场血腥行动。当唐玄宗带着杨氏兄妹行至马嵬驿，扈从禁军停滞不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玄宗说：“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适逢吐蕃使者遮护杨国忠于驿门，众军士讹呼国忠谋反，围而诛之。既诛杨国忠，高力士对玄宗说：“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②于是赐贵妃自尽。杨贵妃死了，背负着红颜祸水的骂名死了，这个美丽的弱质女子以死的方式，为皇帝和朝廷承担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责任。至于唐玄宗，既不能保全子孙，也无力存活爱人，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国破家亡以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至德二载(757)春，杜甫在长安潜游曲江，写下百感交集的著名诗篇《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③

曲江是长安最繁华的游览胜地，每年春季百花竞妍，细柳绿阴，参差楼阁掩映在红花绿柳之间，士女巧笑回荡于和风温馨之际。长安沦陷以来，这里游人稀少，景象凄凉。杜甫春日潜游曲江，睹景怀人，潸然泪下。诗采用插叙结构，开头四句由景生情，引起缅怀之思。“忆昔”十二句追忆往日盛况、感怀物是人非。最后四句抒发内心的极度痛苦。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认为是追究祸乱根源，把安禄山叛乱归咎于杨贵妃。比如王嗣奭认为：“公

① 《读杜心解》卷二，第二二九页。中华书局，1961，下同。

② 《旧唐书》卷九，第二三二页。

③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二二页。



追溯禄山乱自贵妃，故此诗直述其宠幸之盛，宴游之娱，而终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①黄生认为：“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②这是对诗歌本意的误解。实际情况是诗人有感于马嵬驿事件，因而把杨贵妃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既痛其荒淫骄妄，又哀其横遭不幸。诗中对杨贵妃虽有委婉责备之意，但无祸根乱源之词，相反寄寓着对昔日繁荣的追怀和对贵妃香消玉殒的同情。

杜甫在《哀江头》诗中对杨贵妃之死的态度，与他后来在《北征》诗里的态度有明显不同。《北征》诗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③诗中把杨贵妃比作乱政亡国的红颜祸水，视杨贵妃之死为乱源的铲除。前人较多地受到《北征》诗影响，忽略了杜甫对杨贵妃之死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朱东润先生指出，杜甫在《北征》诗里“也谈到贵妃，可是这和《哀江头》的提法有所不同。在那首诗（著者按：指《哀江头》诗）里，他说‘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又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同辇’可能有一些责备的意义，觉得贵妃恃宠放恣，没有做到像班婕妤那样推辞同载，但是这是小节，在玄宗的坚持下，也不一定能拒绝。‘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这些诗句是对贵妃的同情。这是杜甫在听到贵妃之死以后的第一个想法”^④。这个意见符合实际情况，也指明了杜甫创作《哀江头》诗的本意。

（三）陈陶战役的失败

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琯自请率军收复两京，在陈陶斜与叛军展开激战。房琯“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⑤。复战于青坂，再遭败绩。得胜归来的叛

① 《杜臆》卷二，第四十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下同。

② 《杜诗详注》卷四，第三三二页。中华书局，1979，下同。

③ 《杜诗镜铨》卷四，第一六二页。

④ 《杜甫叙论》第六十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下同。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七零零四页。



军在长安城里高歌狂饮，骄横跋扈。杜甫在长安写下了《悲陈陶》和《悲青坂》两首诗。在《悲青坂》诗中，他根据陈陶战役和长安城情况，推断整个中原地区都是“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①的形势。在表达自己和长安百姓“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同时，告诫官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耐心等待时机成熟以后，一举收复长安。

长安乱象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杜甫在沦陷后的长安，耳闻目睹了皇帝仓皇出奔，公卿满门抄斩，龙种沦落街衢，贵妃香消玉殒，官军屡战屡败等事件，对安史之乱的严重性有了真切认识，初步形成了乱世来临的社会判断。至德二载（757）春，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②

诗中描写都城残破的现实，感叹繁华帝京千疮百孔，繁荣景象烟消云散。诗人移情于物，触景伤情，见花而落泪，闻鸟则心惊。他从国家危亡中审视个人的不幸，从个人不幸中表达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把山河破碎的哀痛和个人乱离的苦楚融为一体，发出乱世降临的哀号。

二、邺城战役与社会信心的崩溃

杜甫虽然在长安体认了世道的变迁，但对社会前景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对恢复太平满怀信心。他的乐观态度和信心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邺城战役后才发生改变。

（一）社会信心的保持

杜甫能够在较长时间里以乐观的积极心态面对乱世，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早年形成的乐观自信的社会性格；二是这段时期里社会形势出现了可喜变化。

首先看杜甫早年社会性格对其心态的影响。杜甫的少年时代

①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二四页。

②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二八页。



和青年时代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度过的，恢弘强盛的国势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造就了一代文人开朗乐观、豪迈自信的社会性格。盛唐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等都具有类似性格。杜甫早年在《望岳》诗中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①，展现了青年时代豪迈雄旷的气度和高远开阔的胸襟；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②，显示出高度的自信与自许；在《骢马行》诗中写道“时俗造次那得致，云雾晦冥方降精”^③，反映了超迈时流、卓然不群的精神风貌；在《画鹰》诗中写道“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④，表达了跃跃欲试、待机而动的青春冲动与欲望。这些诗篇和诗句体现了杜甫乐观豪迈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在安史之乱初期对杜甫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心态形成积极的心理支撑。

其次看至德元载(756)夏季至乾元二年(759)春季社会形势的变化。至德元载(756)七月甲子，唐肃宗在灵武称帝。唐肃宗是自己宣布做皇帝的，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事前并没有发出让位的圣旨。李亨称帝第四天，玄宗在西行途中发出制文：“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⑤此文称“制”不称“诰”，对李亨称“太子”不称“皇帝”，说明玄宗认为自己仍然是皇帝，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李亨已经称帝。一个月以后，玄宗在成都得知李亨称帝，于是让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⑥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同时有两个皇帝，而且两个皇帝还是父子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尽管史书对唐肃宗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取得帝位作出“道路险涩，表疏未达”^⑦的辩护性说明，但这种做法归根到底算不上光明正大，也

① 《杜诗镜铨》卷一，第二页。

② 《杜诗镜铨》卷一，第二十五页。

③ 《杜诗镜铨》卷二，第九十三页。

④ 《杜诗镜铨》卷一，第六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六九八三页。

⑥ 《旧唐书》卷九，第二三四页。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六九九三页引《玄宗实录》。



不够理直气壮，其帝位的合法性终究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

唐肃宗的儿皇帝地位是十分尴尬的，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起来，他必须在平定安史叛乱中做出重大成绩，最重要的是收复两京。当初在马嵬驿，建宁王李倓建议李亨“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①。这样不仅可以完成玄宗交给他的“南取长安、洛阳”的任务，而且能够凭借对社稷的再造之功，可以稳坐江山。肃宗采纳了李倓的建议，把收复两京当作首要任务，在凤翔行在积极筹备。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逃离长安来到凤翔。此时凤翔作为讨伐叛乱、收复两京的大本营，呈现出一派中兴气象。“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②。杜甫耳闻目睹皆为平叛复国之事，真切感受到唐室复兴的气象。他在《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 中写道“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③，在《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中写道“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④，把唐肃宗比作汉光武帝，把凤翔行在比作南阳，把肃宗麾下战将比作骁勇善战的汉军七校，对肃宗朝廷实现国家中兴满怀信心。唐肃宗的努力很快取得成效，至德二载(757)九月和十月，长安和洛阳相继收复。杜甫据此认为，平定叛乱已经为期不远。他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诗中写道“胡虏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乞降那更得，尚诈莫徒劳”^⑤，希望朝廷尽诛乱世余孽而后已；在《收京三首》其三 中写道“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枹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毋乃圣躬劳”^⑥，已然在高唱胜利的凯歌了。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六九七六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七零一八页。

③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三九页。

④ 《杜诗镜铨》卷三，第一三九页。

⑤ 《杜诗镜铨》卷四，第一六七页。

⑥ 《杜诗镜铨》卷四，第一七一页。



（二）心理支撑的崩塌

乾元二年(759)三月,在普天同庆的凯歌声中突然传来唐军在邺城战役中全面溃败的消息。朱东润先生指出:“邺城的溃败是这次安史之战中的关键。”^①邺城溃败也是杜甫社会心态发生转折的关键。对于这件具有重大影响的战事,我们现作一些具体分析。

邺城战役始于乾元元年(758)九月,结束于乾元二年(759)三月,历时半年。至德二载(757)两京收复后,叛乱势力被逐渐挤压到邺城一带。邺城是河南通往河北的门户,唐肃宗要想平定河北就必须控制邺城。叛乱残余势力欲保住河北巢穴,则必须坚守邺城。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因此都摆出决斗的架势,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七十六万人,超过天宝十五载潼关战役和至德二载两京收复战役用兵数量的总和。其中朝廷军队六十万人,安史叛军十六万多人。

朝廷尽管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在作战过程中犯下一系列严重错误。在战略上,朝廷调集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等九节度使,聚兵数十万参加战斗,却不设置元帅,各节度使不相统属,部队各自为战,以致兵力数量上的优势不能转化为战略进攻上的优势。在战术上,错误地采用了围困战术。节度使们不是一鼓作气攻克邺城,而是围而不打,在城外“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之”^②。这种战术固然使困守城中的安庆绪叛军无法逃脱,但同时也加强了邺城易守难攻之势,为安庆绪固守城池、等待援兵创造了有利条件。跟军事上的错误相比,朝廷在政治策略上所犯的错误更加严重。邺城战役前夕,朝廷派遣信州太守乌承恩赴范阳,以宣慰为名伺机刺杀已经归顺朝廷的史思明,乌承恩事败被诛。史思明当即召集部下将士,面向长安放声哭诉:“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③随即再次造反,率领所有精兵强将渡过黄河,驰救安庆绪。朝廷实施斩首行动失败,迫使史思明降而复叛,由此制造了强劲对手。

① 《杜甫叙论》第八十七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七零六八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零,第七零五八页。



乾元二年(759)二月,史思明率兵趋近邺城,此时朝廷在邺城周围集结了六十万军队。三月初,史思明率精兵五万在滏水与李光弼、王思礼所部交战,双方伤亡相当。郭子仪率领主力部队紧承李光弼、王思礼之后,未及布阵便大溃南逃。“甲仗輜重委积于路”,“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①。对于史思明与郭子仪两军对决情况,《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记载:“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似乎双方未分胜负。《资治通鉴》是官修史书,站在朝廷立场说话是它的责任,但正史毕竟还有真实记录历史的义务。于是同卷又载:“史思明审知官军溃去,自沙河收整士众,还屯邺城南。安庆绪收子仪营中粮,得六七万石。”^②邺城战役以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合围安庆绪开始,却以安庆绪在郭子仪行营中收缴战利品结束,整个战役攻防转换和胜负结局是一目了然的事实。邺城战役刚结束,郭子仪被改任东京畿山东南诸道元帅,不久又被免去已经担任了两年的天下兵马副元帅职务,由另一位名将李光弼替代。李光弼是邺城战役中损失最小的节度使。这次军事统帅权的变更,实际上是朝廷对郭子仪的处分,正如当时另一位名将仆固怀恩所说:“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③这年九月份,洛阳再次沦陷。

在邺城战役持续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杜甫对国家中兴经历了从满怀期望到彻底失望的转折。乾元元年(758)九月邺城战役开始,李嗣业领兵赴邺城围剿安庆绪,杜甫作《观安西兵过赴关中等命二首》: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七零六九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七零七一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第七零七八页。